

Journal des Anthropologues, 116–117: Anthropologie, Psychanalyse & État. Olivier Douville, and Monique Selim, eds. Paris : AFA, 2009. 615pp.

彭仁郁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人類學與精神分析的糾結關係，自佛洛伊德出版《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 1912~13) 開始便從未間斷。不論是因誤解而起的對峙激辯，¹ 擔憂遭對方併吞而刻意的劃分涇渭，或因研究關懷的共通而相濡以沫，² 用「愛恨交織」(ambivalence) 這個精神分析概念來形容二學門的關係，是不為過的。

或許正是二者在歐陸學界與實務界引發的持續而緊密的對話，令創刊於1990年的法國《人類學家期刊》，³ 繼1996年的《人類學與精神分析》(*Anthropologie et Psychanalyse*) 專號之後，又在2009年下半年，以雙號合輯(第116-117號)的大幅版面，出版了《人類學、精神分析與國家》，再度將發聲筒交給人類學家、精神分析學者暨臨床實踐者，以及從事心理醫療研究的社會學家或民族學家，分別從不同觀點闡述人類學與精神分析在當代嶄新社會情境中的合作可能。然而，在讀過編輯序、16篇研究文章和6篇重量級學者的訪談後，讀者不免在字裡行間察覺，這二門學科在當前歐洲的學術政治氛圍下遭遇了共同的危機。其中涉及的不只是兩學科的內部危機，亦即是否能提出適切的理論概念，以捕捉現下急遽變動的集體或個體的真實，更牽涉到國家體制、個人或群體對人類社會應然的想像等外部條件，是否容許關注主體性、異己性及文化層

- 1 最著名者如20年代Malinowski與E. Jones的辯論，或如李維史陀與拉康在60年代的不成功的對話。
- 2 比方精神分析人類學Psychoanalytical Anthropology，或民族精神分析學Ethno-psychanalysis 次學門的建立。前者創立代表人物為Géza Róheim，後者為Georges Devereux。
- 3 由法國人類學家學會(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s Anthropologues, AFA) 發行，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及國家圖書中心等單位贊助之學術季刊。

面的精神分析與人類學，繼續在學術體制內續存的問題。此次專題名稱中加上「國家」二字，無非是為了納入國家政體與心理生活關聯的考量。

負責專題的兩位編輯Olivier Douville和Monique Selim，⁴皆兼具人類學家與精神分析學家兩種身分。有別於史上數度嘗試結合二學門基礎理論架構的努力，他們開宗明義便排除了任何烏托邦式的統整企圖，而希望在彼此的反思對話中探尋聯盟的可能。Douville和Selim提出了三個環環相扣的對話軸度——田野與臨床、瘋狂與國家、知識對象與知識論。接下來筆者便順著這個脈絡，嘗試在有限的篇幅中，概述這二十多篇在研究對象、思考向度上極具異質性、又相互呼應的豐富文本，所欲呈現的核心觀點。

一、田野臨床、臨床田野

A. Verstraeten, M-A Berthod, K. Lazali, O. Douville, N. Khouri等幾位作者的文章，都訴說著自身研究場域中田野與臨床不可避免的互涉。這些研究者的田野或臨床實踐場，迫使他們溢出單一的學科訓練，而讓人類學田野工作染上精神分析式聆聽的色彩，或讓臨床工作者對遭逢的主體（異己者）展開人類學式的觀察與探索。當人類學家A. Verstraeten聽著阿根廷「五月廣場的母親」們敞開心房、吐露獨裁時期親人的「失蹤」如何在身體和語言層次劈開永遠無法撫平的裂口，而社會運動集結的新關係網絡，又如何激勵這些「受難家屬」反過來將受創的身體和言語轉化為抵抗政權壓迫消音的武器，她的聆聽所蒐集到的就絕對不只是一般的田野資料而已，而是觸發行動的種種私密動機與創傷經驗。

研究職場哀悼經驗的M-A Berthod也選擇了人類學田野與心理臨床的交界作為研究場域，他的〈哀悼研究筆記〉即企圖打破傳統心理學與人類學選取特定現象範疇作為觀察、解析對象的成規，以互補彼此的視框局限。N. Khouri藉著針對被迫由莫三比克遷徙至里斯本（前殖民宗主國）的弱勢族群（伊斯瑪儀）女性的回憶敘事研究，揭露了不同族裔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之間的移情與

4 前者為巴黎狄德羅大學（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臨床人文學院副教授；後者為歐洲「發展研究中心」（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IRD）研究員。

反移情關係，因而指認出累積多重弱勢的主體在不同的他者面前，如何形塑自身形象、協調相應的存在位置。

精神分析臨床工作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是，透過貼近潛意識的話語，試圖理解主體在何種個人史脈絡中形塑他所處世界的知識，以及在關係中的實踐行動。基於此點，我們可以說臨床即是分析師的田野，亦是他建構理論知識的來源。這定義在分析師K. Lazali的〈內戰與異鄉人的位置：從在阿爾及利亞的精神分析執業經驗談起〉文中，獲得充分彰顯。在此經濟、政治極度動盪的社會裡，作為象徵體系的語言跟言說主體一併遭受暴力摧殘，鼓動潛意識主體說話的精神分析，聆聽的不僅是個體的創傷，更是一種無端自相殘殺的社會氛圍如何斬斷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根基。這個以國家集體暴力為臨床田野的研究，引領我們進入人類學與精神分析對話的第二個軸度：瘋狂與國家。

二、瘋狂與國家

本合輯從兩個面向來談「瘋狂與國家」的關聯。(1) 非民主國家政體自身的運作可能化為一部製造恐怖暴力的瘋狂機器，混淆建構主體的真實、想像與象徵三向度，破壞人與人的關係，阻斷心理生活的代間傳承。O. Douville的研究即可放在這個脈絡下來談。Douville〈戰火下的孩童與青少年〉一文，從對飽受族群戰爭斷傷的「童兵」主體提供臨床協助開始，到對馬里、剛果、賴比瑞亞、塞拉利昂等非洲國家狂亂政治情境的探查，進而了解到傳統象徵秩序的激烈摧毀，如何讓這些原本視孩童為祖先的社群，竟把年幼稚子妖魔化為惡靈附身的巫童，以致斷絕了這些在邊界飄零的孩子歸返社群的機會。

(2) 另一方面，在民主、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中，「瘋狂」則逐漸遭到新國家管理體制的驅逐、污名化，淪為一群阻礙社會運作的機能喪失者。而被工業化的心理治療技術，更在國家力量的推動下，為大眾設定何謂心理健康的標準化定義，變相促成了國家控制力量潛入心理醫療空間，掌控公民的心理生活。G. Raveneau在〈當今社會工作中社會關係的心理學化與去主體化〉文中描述的，即是被臨床心理學標示為具有反社會人格傾向的兒童，如何在制式的心理諮商技術中完全被抹除主體性。F. Liégard〈社會關係的精神分析與社會學〉一文則透過青少年犯罪的社會人類學研究，對傳統精神分析狹隘的家庭框架提出批

判，他認為精神分析與社會學的結合將有助於揭露受困主體的社會脈絡，進而抵擋國家心理衛生政策去人性化的危機。

另外，S. Léze的〈佛洛伊德學派政治學：臨床危機與個人問題控制〉，嘗試釐清法國行政體制與認知心理治療學派近20年來對精神分析進行法制約束和學理正當性抨擊的社會效應，並檢視精神分析社群提出的應對策略與省思的適切性。他做出了一個弔詭的結論：一方面，法國的心理臨床需求者似乎未準備拋棄強調主體殊異性的精神分析；但另一方面，以資本主義經濟市場為前導的消費社會愈來愈鼓勵強調快速有效的精神藥物，和宣稱可量化掌控療程與癒後的療法。為了對抗國家機器、資本主義消費邏輯與科學效率神話的聯手攻擊，精神分析學者勢必不可固守傳統理論概念，渾然不覺於當代社會情境的變遷。

三、知識對象與知識論的辯論

此對話軸度的必要性，因著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界內部逐漸出現向認知科學靠攏，以尋求某種科學認證的趨勢，而更顯急迫。本專輯中訪談了六位重要學者。他們不論是否兼具人類學家和分析師身分，或對精神分析與人類學之間聯盟關係的可能型態有不同的看法，都不約而同的認為，此二學門知識論典範的接近，令它們有潛力連袂抵制以行為科學實驗客觀化人類思考和認識模式的企圖。精神分析與人類學或民族學的研究對象，並不是認知科學試圖以邏輯理性、適應模式描繪的人。兩個領域對言語、世界的共識是：言語，不是一個操作概念，甚至不只是一種溝通工具，它擁有創造、想像、召喚不在場事物的能力，如此，主體才能在世界中以一種非工具性的、詩意的方式活著；而世界，絕對不可被化約為人類認知能力的實驗室，或行為矯正的教育機器，而是一個讓關係發生、容許無數超現實慾望夢境展演的場所。若我們把第二和第三軸度放在一起來看，便不得不同意編輯所提出乍看之下似乎言過其實的警告：人文社會科學認識論的問題，不僅是一個學術研究觀點的問題，更涉及認識論典範的選擇是否可能導致合理化權力宰制關係的險境。

以下概述幾位大師在專訪中提出的對二學門串連可能性的看法。Maurice Godelier清楚區分人類學與精神分析的研究對象和取徑，他認為前者分析的是異己社會人際關係的建立（屬於他界定的「社會自我」的範疇）；而精神分析關注的是個人層次的心理運作，特別是性／性別壓迫對個人身體、慾望的影響

(他稱之為「私密自我」)。對他而言，即使二學門或有共同研究對象(神話、夢境等)，仍不應混淆二者知識體系的根本差異。或許是對當代精神分析文獻的不熟悉，令Godelier把精神分析研究的範疇固定在性生活和性別角色上，甚而明言這是精神分析對人類學唯一的可能貢獻。

精神科醫師及人類學家Richard Rechtman引用傅柯在〈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中的論點，重申精神分析與人類學的唯一共同點是：把個人的獨特經驗，嵌進不斷演變中的集體意義網絡裡。實際上，這論點凸顯了文化主體形構過程中，個人與集體層次不可分割的辯證關係。對於精神分析正面臨逐漸式微、恐被認知心理治療學派逐出學院和醫療場所的危機，他坦言，必須對精神分析進行人類學研究，以協助它反思、更新伊底帕斯、父性功能(fonction paternelle，或譯「父性函數」、慾望、執爽(jouissance)等根本概念的當代意涵。他指出，性別研究即是聯繫二學門、令雙方檢視自身概念適切性的當代研究領域。L. Le Corre的〈有沒有女同性戀精神分析師？〉，正呼應了精神分析須當代化其性別觀點的提醒。

在精神科工作的哲學家F. Gabarron-Garcia並不反駁Rechtman的說法，但在〈從精神分析的人類學研究到人類學的精神分析研究〉中，他強調這樣的學科審視應該是雙向的。他比較了結構人類學創始者與重返佛洛伊德運動領袖二人分別打造出的象徵概念，進而批判隱含在李維史陀「象徵效能」概念背後的認識論，其實仍沉浸在一種科學因果關係法則的自然主義典範裡。

主張人類學者可用隱喻方式借取精神分析詞彙的Marc Augé，在簡單回顧了兩學科間的對話歷史之後，認為二者有一致的研究對象(作為文化主體的人)，但研究方向卻恰好相反。精神分析的對象是在關係網絡中的主體，協助他藉由話語建構自身；而民族學(人類學)家則試圖從眾多主體的個別命運中捕捉令社會整體得以建構的制度體系，但不著重體制對個人命運的影響。在此，兩學門雖保持其特異性，但區隔二者的邊界較為流動。在他看來，尋求民間療癒協助的心理層面、田野中研究者的孤獨，都是雙方可能合作的研究課題。在這方面，A. Y. Guillou, Olivier R Grimh和Monique Selim分別在訪談中論及移民的臨床實踐田野、殘疾人類學、民族學者田野關係的形織等研究主題，正因為其中皆牽涉複雜的主體化過程及研究客觀化的雙重要求，適足以為兩學門開關銜接的機會。L. Moreau de Bellaing的〈驅力理論和批判人類學〉，可謂是一

次精神分析與人類學理論視框嘗試結合的示範，他以驅力理論作為田野現象觀察的深度框架，以掌握田野中原本不可見的對峙勢力。這樣的嵌合嘗試，當然需要更多實際的田野研究來支持它的適切性。

縱論之，編輯們認為學術史上試圖整合精神分析與人類學的幾次失敗經驗，不應成為二學門對話的阻礙。特別是在這個全球化勢力波及世界各個角落的時刻，世代結構的崩解、交換法則的抽象化令贈予幾乎等同於犧牲、行為與話語因媒體的立即性讓人們不再能感知其象徵價值等，皆是人類學家、精神分析師和心理臨床工作者不得不面對的極大轉變。易言之，當代的主體與主體性、文化身分認同，正等待著不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為它們重新界定。

法國《人類學家期刊》在此合輯中探討的學術跨界對話的時空背景與動機，或許對臺灣學界而言有些遙遠。然而筆者認為這個在歐洲斷斷續續進行了一世紀的辯論，值得臺灣人文社會科學學界與心理臨床實務界借鏡。原因之一是，理論與實踐在精神分析中原是不可或缺的一體兩面，在臺灣卻一直處於分裂的狀態，違背了精神分析對於文化主體的知識應從臨床實踐（田野）而來的根本原則。近年來，欣見臺灣精神醫學界掀起了另一波「重返精神分析」的風潮，儼然欲抗衡在臺灣早已盛行日久的認知取向心理治療。但這究竟是流行浪潮的更迭現象（倘若如此，精神分析將不過淪為另一種臨床醫療技術），還是臨床實踐者終於展開對新資本主義在主體內部暗植自我異化深層邏輯的根本省思，抑或是一種複雜的異質結盟需求而產生的現象，尚待觀察。再者，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如何讓「人」這個曾經隨著「主體已死」的宣稱而隱身退場的概念，重新返回研究關照的核心，雖不是嶄新的議題，卻依然是當代研究者須奮戰堅守的價值。通過對本專輯的引介，筆者期待，人類學與精神分析的對話，不再只是文化研究或後殖民研究學者的專利，而能成為為所有「人」的研究開啟新視窗的引子。

此期刊以法文出版，每篇文章後附英文摘要。凡是對人類學田野的心理面向、精神分析研究的人類學意涵，或國家暴力與精神疾病之關聯有興趣的讀者，都值得一讀。